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174-06

马克思民主观的经济学视阈 ——兼论《资本论》中的民主思想

郭 丽 兰

[摘 要] 《资本论》中蕴含了丰富的资本、资本主义批判思想,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方面内容,民主则是《资本论》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政治维度。《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分析,从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劳动二重性理论、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有机体结构出发,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最终的价值诉求,即实现每个人及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 《资本论》; 民主思想; 价值指向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资本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它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集成,同时涉及政治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方面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具体的政治事件,深入分析,将经济学的讨论与广泛的政治主题联系在一起,包括个人和社会,劳动的性质,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空闲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资本主义革命的性质及其固有的普遍性等问题^[1](第279页)。《资本论》表明,并不如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样马克思是专制和集权的,相反,通过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多角度考察,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丰富的民主思想。如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包括《资本论》3卷在内的相关著述,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过程展开的,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性分析,其中内含了丰富的民主思想。

一、商品经济中的民主要求: 平等和公平

商品经济为民主和自由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寻求内在的均等,而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提供自由、平等的实现条件,终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究其理论根源,在于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进程中,商品经济的独立发展完全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地缘、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差别,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唯一的尺度^[2](第84页)。在商品交换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流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3](第197页)。一切商品经济都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它内在要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和平等。随着自由竞争商品经济的繁荣,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成为政治社会的主导。但在“全民民主”的口号下,民主运行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这与其建立的所有制基础是紧密联系的。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都在商品交换的经济发展格局中进行。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换领域是平等和公平的,但从现实后果来看,呈现出来的却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平等在这里并不存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分析,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生产领域中去寻找答案。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它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等价交换,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仅仅是表面上的交换,“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4](第640页)。通过对劳动力的剥夺,资本主义生产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剩余劳动也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实质就是,交换领域的平等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掩盖了。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指出,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一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必然导致商品交换的形式平等和商品生产的实质不平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把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哲学的相关概念和商品、货币联系起来,前者是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后者为前者提供物质基础。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过程的还原,商品经济领域中的交换平等与劳动不平等导致的政治普选与实际不参与决策的矛盾得以凸显。

二、马克思关于民主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

对民主政治的探讨,马克思经历了从理论抽象到具体分析的发展过程。早在19世纪40年代,《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第一次进行了深刻反思。围绕着市民社会和国家,1843年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集中考察和理论概括,提出人民主权、民主制和立法权等现代政治国家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核心命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述进而转向政治背后的经济、社会、哲学根源研究。《资本论》则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具体过程入手,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理论分析;另一方面,对政治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哲学阐释。马克思提出,政治上层建筑建立的基础是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生产和经济的基础在于社会劳动,因而分析政治问题应从社会劳动入手。

劳动是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范畴,也是其探讨民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理解马克思民主思想的重要支点。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1857—1858年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提出的。在这一手稿中,劳动二重性成为统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和思想主线,劳动二重性指的是,任何劳动都同时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这二重属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劳动的特殊性包含了人类劳动的一般性,劳动的一般性则存在于各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形态中。任何劳动活动,都毫无例外地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特殊劳动和一般劳动的有机统一^[5](第10页)。当人类步入正式的社会交往群体之中,劳动二重性成为独立个体与社会成员二重属性的集结所在。当这二重属性在社会共同体中发展不平衡时,矛盾便产生了,民主便是其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当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段,政治革命便成为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细致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在根源上的深层对立,这种对立是个人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独立的个体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之间二重性的张力矛盾。这一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分裂越演越烈,而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得以解决。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从方法论出发,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人民和主权等主谓关系进行了颠倒,而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从抽象的政治讨论转向其背后的实质析分,对民主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界定和丰富,完成了从抽象思维到具体论证的转变,确定了讨论问题的思想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了劳动的二重性分离,要弥合这一矛盾,实现必然向自由的转化,就要从劳动的本身,从主体的物化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由于分工、交换所导致的商品和货币、劳动的物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物化,形成了物的依赖的历史性。要消除这种物化的形式,有赖于自由

劳动的实现。马克思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通过社会劳动私人化完成的,而在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这种劳动性质被颠覆了,即“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第95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未来社会的劳动形态进行了细致描述,“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绝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里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6](第113页)在那里,劳动成为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并走向社会化、自由化和自主化。随着物质条件的充分发展和工作日的缩短,劳动将成为真正自由的劳动,人的自由个性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劳动真正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条件。

三、《资本论》中的民主与社会有机体理论

劳动二重性是讨论民主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民主思想的系统展开则是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理论中进行的。“社会有机体”是《资本论》中的核心范畴之一,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通过这些概念,马克思揭示了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民主产生、发展、变化的条件、过程和发展趋势。民主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呈现出有机的构成序列,这是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政治思想实现的巨大变革。

(一)民主的产生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深入政治背后的物质、经济因素,从经济结构入手讨论民主政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第32页)《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对意识依赖于物质条件有过类似粗糙的叙述。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法律、政治等国家形式的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并且通过经济基础或者物质条件来理解。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产生、发展建立于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当然也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不同的社会形态,由于物质资料的基础不同,决定了其政治性质的差异。正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由于建立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即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个人所有制”的差异,导致两种民主制的性质处于对立。马克思指出,法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综合,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因而民主政治的源头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到经济形态和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正如汤姆·洛克曼对马克思《大纲》中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所作的推断,既然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政治经济是最基本的,那么沿着不同的经济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会有不同的上层建筑,在特定社会中能够找到的所有非经济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依赖于其经济基础的,那么改变其经济基础就会带来其上层建筑的变化^[8](第177页)。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包括民主在内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变化。

(二)民主与经济、社会结构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

民主政治产生于社会物质和经济结构。在整个有机体结构中,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体现着良性互动的张力。

首先,民主的主体与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民主政治产生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民主主体能动性的开发和培养与生产、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民主主体素质的提高,对生产的协调和加速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剩余价值学说》中指出,“人本身是它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

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9](第300页)提高物质生产力,加强民主主体的文化、道德、生理和心理素质,对整个社会的民主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民主主体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又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选举建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间的经济联系。”^[10](第289页)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它的实现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因而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有机体结构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运行方式应该包括在民主的考察框架之中。

再次,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民主发展的具体形式存在着差异。《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不同社会形态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导致民主的性质有所差异。即使在相同性质的社会中,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差异,民主的存在形式也存在着不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美国 and 欧洲市民社会发展作了不同的批判性分析,指出,作为不同历史背景中的美国和英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构筑市民社会的道路及实现民主的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态势。马克思批评凯里和巴师夏两人不加区别地对待不同的发展形式,指出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3](第9页)马克思为我们勾画出19世纪市民社会的民主形态,它们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呈现出的不同发展方向以及之间的尖锐冲突。

四、马克思论民主与国家职能的变迁

民主政治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有机体基础之上,民主的发展趋势与社会有机体的历史演进存在着一致性。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到“对物的依赖关系”,最后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民主的发展同样也遵循着这一规律,从最初的城邦民主到资产阶级民主,再到社会主义民主。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与国家职能的变迁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的发展正是国家职能历史变迁的过程性呈现。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国家职能并不如以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发挥的不仅是政治职能,而且也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它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职能^[1](第171页)。早在1844年底,马克思在中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后,曾打算专门写作一部论述现代国家理论的著作,一方面展开对现代国家制度本身的研究,另外展开对国家的经济形式及其职能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等论题,作为后一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12](第238页)。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于国家职能问题的资料,涉及到国家职能的两个方面,比如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非生产”阶级问题;一国的人口密度、迁移、发展和国内移民问题等^[13](第401页)。

马克思用概括性的语言指出,国家经济和政治职能上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方面,国家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的工具,使用司法、警察对财产的保护;同时,任何社会的国家都要为这一社会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提供一般物质条件。与经济领域的二重性相适应,国家在政治职能上也有二重性:即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4](第432页)其中,政治统治是直接解决“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而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则是“由一切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经济管理,维护生态平衡,从事科教文卫等活动^[15](第139页)。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导致国家职能的两重化必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

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9](第 314-315 页)。另外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协调功能也日益突出。国家职能的二重性,一方面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决定的,同时也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这二重性的矛盾在经济运行中,得到突出体现^[3](第 417 页)。国家政治和经济职能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职能的重心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国家职能的重心变化,正是社会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通过对国家职能、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探讨,马克思提出,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与控制功能的日益增强,这与民主的历史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成为社会的公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从经济领域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不断弱化,人民通过各种民主的方式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国家职能中的公共权力逐步失去政治性质,政府最后成为社会内部的一个管理机构。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国家的政治职能不断萎缩,社会公共事务职能不断地扩大,社会管理公共事务越多意味民主化程度越高。政治国家随着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亡”。

五、马克思民主观的价值诉求

民主是马克思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方式,通过民主政治,实现政治的单个人和市民社会成员的二者统一。但是民主只是这种统一的表现形式,它并不是《资本论》探讨政治问题的根本目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治问题细致研究的目的是,怎样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共产党宣言》指出,通过政治革命和解放,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获得自由的对象和范围不断地扩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活动方式的改变,民主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终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19](第 294 页)。《资本论》进而把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指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至于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自由”如何实现,马克思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进行了考察。

(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基础

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劳动的颠覆,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第 95 页)。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所有制基础。具体来说,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建立于“公共的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指的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第 832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指出,必须消灭私有制,消除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别人劳动的占有。这里,马克思进一步论述如何消灭私有制,即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指的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与生产资料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导致劳动条件与劳动者分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占有方式——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身发展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未来社会还要经历一次否定,即个人与生产资料的重新结合,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未来社会中,个人与生产资料重新进行结合,在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所有权、支配权上重新进行分配,特别是针对支配权重新建立所有制形式。重建“个人所有制”使得劳动从根源上逐渐摆脱二重性的分化,成为真正的社

会劳动。只有建立这一所有制基础,才能实现“个体”劳动与“协同”劳动、“单个人”与“类成员”的一致。只有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才能保证自由的真正实现。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诉求

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态,“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3](第104页)在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这一自由个性,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高度发展,共同所有。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客观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是主体实现自身的能动过程,是人类追求解放、不断改造现存社会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由和发展得到充分展开,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分化、疏离得到消除,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和全人类的解放。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将成为直接社会性的个人,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全面的发展,真正成为社会和自身的主人。民主的价值目标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真实地得到表现,在社会主义民主中,每个人都将成为真正的自由个体、自觉的活动者。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这里针对的是以往阶级对立社会中,以绝大多数人的牺牲来实现少数人的发展,重点在于每个人,一切人,而不是单个人。

《资本论》是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又一次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全面剖析。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性行为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等政治观念进行了理论阐释,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的经济学根源。马克思指出,应该从劳动二重性的分裂和弥合看待民主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民主最终的价值目标和历史归宿就是实现每个人及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2] 荣剑、杨逢春:《民主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4]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5] 王东、林锋:《〈资本论〉第一手稿的五大哲学创新》,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6期。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8] [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杨学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11] 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13] 汤在新等:《〈资本论〉续编探索》,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 [14]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15] 刘军:《国家起源新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